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

《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研究

何方昱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博士文库

“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

《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研究

何方昱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
研究 / 何方昱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8
(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 第9辑)
ISBN 978-7-80678-862-2

I. 科… II. 何… III. 人道主义—研究—中国—1941～
1948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5624 号

责任编辑 完颜绍元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王晓阳

“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研究 何方昱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280,000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78-862-2/B·67
定 价 55.00 元

序

这是一部研究近代思想学术谱系的专门著作。这部著作所研究的,是20世纪40年代以张其昀、张荫麟、钱穆等为中心的一群学人,以《思想与时代》月刊为中心,本着倡导和践行“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这一基本宗旨,所从事的学术活动。作者在研究这一课题时,仔细研读和剖析了《思想与时代》月刊上的文章,对于这批学人思想学术所涉及的中外相关领域,作了认真考察,就他们的文化观、科学观、教育观、政治观逐一梳理,展现了这批学人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人文与科学、通人与专家之学、政治与学术之间寻求贯通与结合所作的艰苦努力,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批常常被人们目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学人,对于科学其实持有非常积极的态度,与他们交往密切的自然科学家们也同样对于人文持有非常积极的态度。海内外一度流行的中国“五四”后即笼罩在科学主义统治之下,其实并不符合事实。

思想学术的产生与演变,根据于社会本身的变动。然而,这只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源”。思想学术取何种形态,成熟程度如何,还有文明的传承与积累,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流”。思想学术谱系特别重视“源”与“流”的结合,重视二者如何统一。思想学术谱系研究,在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特别强调阶级斗争与“两岸对垒”时,一度被忽视,人们关注不是很多。1979年“平反”后,我第一次在课堂上讲授中国现代思

想史时,便试图通过思想学术谱系展现现代中国思想沿革的全貌。其后,在指导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时,又有意识地希望他们将单个人物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思想学术谱系结合起来。多年之前已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的章清的博士学位论文《“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1〕给这些研究作了很好的示范。何方显的这篇博士论文,又是一项令人欣慰的成果。此外,还有一批论文,分别考察了研究系、〔2〕国家主义派、〔3〕中国苏俄归来的留学生、〔4〕自由主义在台湾延续及演变,〔5〕以及《东方杂志》、〔6〕南高一东南大学《史地学报》〔7〕等刊物学人群,这些论文都正在继续修订补充之中,将争取陆续加以出版或集合在一起予以出版。

思想学术谱系的研究,在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中,一是更多关注单个思想家研究与学人群体思想学术研究的密切结合,二是在思想学术的个案研究中更多关注思想与学术的传承和沿革。思想学术谱系研究,起源甚早。《七略》与《汉书·艺文志》已开其先河,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可以说,更是思想学术谱系研究的典范之作。可惜,近代以来,这一类研究明显减弱。

〔1〕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自由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与“权势网络”》,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后以《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为书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

〔2〕 吴炳守:《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建设构想及其实践(1911—1932)》,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1年。

〔3〕 孙承希:《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3年。

〔4〕 汪乾明:《二十年代中国留俄学生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1年。

〔5〕 王刚:《试论中国台湾自由主义谱系中的李敖》,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6年。

〔6〕 洪九来:《现代公共舆论的催生与培育——〈东方杂志〉研究(1904—1932.2)》,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后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为书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7〕 陈宝云:《学术与国家:〈史地学报〉及其群体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2006年。

综观近代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不难发现,近代中国思想与学术,虽然常常直接渊源于域外思想学术的输入与传播,更多地则表现为本土思想学术的延续与更新。域外思想,或源于美国,或源于英国,或经留日学生,或经留法学生,或经留德学生,或经留苏学生,各种思潮一一传播于中国。而本土思想,不仅儒、道、法、墨、法相、华严、天台、净土不一,同为儒学,岭南、湖湘、两江、两浙、齐鲁、中原、巴蜀、关陇、三晋、燕赵也各有特色,彼此之间的差异不下于儒道或儒法、儒墨之间的歧异。所源不同,往往会形同水火。但不同思想学术谱系之间,又密切互动。主要源于本土者,在自身流变中,不断寻求域外学理的支持;主要源于域外者,在自身流变中,又不断吸取本土资源,以使自身本土化。不同思想学派自觉地或被动地彼此渗透,互相吸引,互相依存。近代中国思想学术谱系各种色度正是由此形成。思想学术谱系研究,因之更易展示近代中国思想学术的整体性与复杂性。

思想学术谱系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思想家、学者们留传世人的各种论著,同时,要关注与之志同道合的学人群体如何聚合,如何共同切磋,共同成长,关注思想学术萌芽、成长与变化的动态过程,关注不同学术派系之间互相争论、互相辩驳、互相消长的状况。这就需要考查相关的各种资料、报纸、杂志、日记、书信、档案、口述资料及其他各种文献,考查社会思潮、大众的回响或反应等等。由于学人群的形成,常常以大学院系、专门研究机构、学会、刊物等作为载体,或以党派及其他社会组织为其活动的主要平台,思想学术谱系的研究便必然要与对它的具体而深入的研究结合起来。正因为如此,从事思想学术谱系的研究,必须更加坚毅,更加耐心,付出更大的努力,运用各种有效的研究方法,以理清事实,辩明真相,突破成见,发现真理,要有更为远大的眼光,更加周密的思维。

何方昱的这部著作,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答辩以后,她又对

论文作了若干补充订正。就她而言,近代中国思想学术谱系的研究,还仅仅是开始。期待她以本书为基础,继续发奋努力,进一步开拓视野,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特别是在理论思维方面,要狠下苦功,继续前进,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姜义华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目 录

序	姜义华	1
绪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学术史回顾		9
三、研究缘起		27
四、材料与框架		29
第一章 学人、媒介与国家		33
第一节 张其昀的早年学术道路		34
第二节 二张会合		44
第三节 契合于时代		49
第四节 张力与共生		58
第二章 学人、学社与学术		62
第一节 学界“自组织”		62
第二节 作者群辨析		96
第三节 内容剖析		111

第四节	主编厘正	115
第五节	专刊及丛刊	123
第三章	“融贯新旧”	131
第一节	儒家文化的重构	132
第二节	中西文化的差异	153
第三节	融贯中西的现代之路	166
第四章	“沟通文质”	178
第一节	反思科学主义	178
第二节	“科学家学人群”	182
第三节	科学与人文	187
第四节	应用科学与纯粹科学	197
第五节	“沟通文质”的特定内涵	208
第五章	“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	212
第一节	“通人尤重于专家”	212
第二节	从柏拉图到怀特海	220
第三节	通才教育观的实践	234
第六章	“为现代民治厚植其基础”	252
第一节	建都问题	253
第二节	五权宪法	275
第三节	学术与政治的颀颀	282

结语：失踪的刊物？

——《思想与时代》月刊的历史定位 297

第一节 追寻意义 297

第二节 确定坐标 306

第三节 学人与政治 315

附录：《思想与时代》月刊目录(1941—1948) 319

征引文献 337

后 记 364

图表目录

表 2-1 《思想与时代》学社核心社员情况简表 67

表 2-2 《思想与时代》月刊作者统计表 96

表 2-3 《思想与时代》月刊作者群出生年代统计..... 107

表 2-4 《思想与时代》月刊作者群国内教育背景统计..... 108

表 2-5 《思想与时代》月刊作者群国外教育背景统计..... 108

表 2-6 《思想与时代》月刊作者群所学专业统计..... 109

表 2-7 《思想与时代》月刊作者群服务单位统计..... 110

图 2-1 《思想与时代》月刊内容之分类..... 114

表 2-8 《思想与时代》月刊各主编时期刊物内容分类统计..... 115

表 2-9 《张荫麟先生纪念号》目录 《思想与时代》月刊
第 18 期(1943 年 1 月) 124

表 2-10 《梅迪生先生纪念专号》目录 《思想与时代》月刊
第 46 期(1947 年 6 月) 125

表 2-11 《思想与时代》丛刊第一种 《儒家思想新论》目次 127

表 2-12 《思想与时代》丛刊第二种 《现代思潮新论》目次 128

表 2-13 《思想与时代》丛刊第三种 《哲理与心理》目次 128

表 2-14 《思想与时代》丛刊第四种 《科学概论新篇》目次 129

表 2-15 《思想与时代》丛刊第五种 《政治与教育》目次 130

表 4 - 1 《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科学家学人群情况
简表..... 183

表 5 - 1 钱穆理想中的大学模式..... 218

表 5 - 2 各种新生复试成绩比较表..... 240

表 5 - 3 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二、三、四年级课程表(1939 年度
第一学期) 246

表 5 - 4 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编纂工作分类表(1940 年) 249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本书的研究对象乃一学人群在 1940 年代创办的《思想与时代》月刊(1941—1948),这是一份在战时及战后的中国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同人刊物。刊物高悬一个目标,即“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这是刊物核心撰述人张其昀、张荫麟、钱穆、谢幼伟、郭斌龢、贺麟、朱光潜等七人及其他作者所秉持的一个信念。按其主编张其昀所言即为:“科学人文化是现代教育的重要问题,也是本刊努力的方向。具体地说,就是融贯新旧,沟通文质,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导,为现代民治厚植其基础。”^{〔1〕}以当下眼光审视这一创刊宗旨,新意或许并不明显,然若将其放置在历史的脉络中,其意义与价值则得以彰显。

中国是一个人文传统深厚的国家。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一直将伦理道德看作全部社会的根基与本源。无可否认的是,这一人文主义的传统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绵延数千年之久的重要原因。然百

〔1〕 张其昀:《复刊辞》,《思想与时代》月刊第 41 期,1947 年 1 月,第 1 页。

年以来,中国遭遇西方世界的强有力挑战,中西文化在相遇碰撞中凸显优劣,时贤所发出的振聋发聩之声至今仍不绝于耳,有识之士亦开始反省,并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作重新估定,同时对于已经进入科学时代的西方有了较前人更为深入的了解。^{〔1〕}晚清思想界的重要人物康有为,在《康子内外篇·仁智篇》中特别强调智的作用,康氏言:“惟其智者,故能慈爱以为仁,断制以为义,节文以为礼,诚实以为信。夫约以人而言,有智而后仁、义、礼、信有所呈,而义、礼、信、智以之所为,亦以成其仁,故仁与智所以成终成始者也。”^{〔2〕}实际上,康有为已经敏锐地指出,智为西方文化的中心,在中国,这一中心则是仁,故西方文化为理智型,中国文化为伦理型。^{〔3〕}对于智的重视,亦是对理性的尊重,此点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更为重要。

与此相似,严复在其《救亡决论》中亦对陆王之学提出疑问:“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通过中学西学的比较,严氏认为:“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故高明。”^{〔4〕}尽管如史华兹所指出的,严复所信奉的只是一种归纳主义的逻辑学,但严氏更为看重的是“这种逻辑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逻辑错误倾向有独特的纠正与解毒的功用”;进而言之,即“这些逻辑错误在严复心目中是与

〔1〕 关于晚清的西学传播,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2〕 康有为撰,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

〔3〕 姜义华认为,康有为是最早注意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在结构揭示中华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各主要特征的思想家,“在中国,正是康有为第一个注意到这一根本区别”。参见氏著《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1页。

〔4〕 严复著,周振甫选注《严复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2页。

中国文化的主要弊病：消极、惰性、拒绝付出最大的努力紧密相联的”。^{〔1〕} 要用西方的科学来纠正儒学的偏颇之处，已经成为这些思想巨子的共识。

作为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在其订立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区分了德育与智育的不同，正如张灏所言：“西学在梁的思想里有着伦理学原理和自然界原理的区别，或更明确地说，德行和知识的区别。这种区别最后在德育和智育的区分中达到顶点，先前在儒家传统里一直是不明显的。”^{〔2〕} 对于将伦理道德视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言，^{〔3〕} 20世纪初这些启蒙思想家锐利的目光犹如闪电，带给近代中国的震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到达高潮。

事实上，从清末民初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价值的重新评估，以及1923年轰轰烈烈的“科玄论战”，都是思想界有识者在中国的人文传统与西方的现代科学之间，为现代中国寻找方向与路径所做的种种努力。

〔1〕 [美] 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

〔2〕 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3〕 韦政通将传统文化的特征概括为“泛道德主义”，所谓“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意识越位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本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要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姜义华通过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厘清，得出了与韦氏相同的论断：“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当时《礼记·中庸》中所说的‘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一思维方式，中心是道德本体主义。‘尊德性’成为全部认识活动或思维活动的总前提。”金观涛、刘青峰将这种儒家文化的特征概括为“伦理中心主义”，所谓伦理中心主义，“是指把伦理道德看作高于知识价值之心态。中国自孔子开始，一直主张伦理道德的价值优先，知识系统也是适应儒家伦理的。”参见韦政通：《儒家与现代化》，台北：水牛出版社1978年版，第85页；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序，第5页；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版，第214页。

然学界以往于此的研究似稍有偏颇。尤其对科学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影响有所夸大,而对 1930 及 1940 年代中国思想界对沟通中西文化所作的努力重视不够。〔1〕在围绕中国“科学主义”(scientism)的论争中,一般以美国学者郭颖颐的研究最为学界推崇。通过考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郭氏断言,唯科学主义在中国以其“最高形式——唯物一元论”取得胜利。〔2〕在论及“科玄论战”之后的年代时,郭氏指出:“在急切和混乱的三四十年代中,这种寻求科学的精神觉醒,所期待的不是经验论渐进和多元的思想方法,而是唯物论唯科学主义的教条结论。”〔3〕这样的论断不免过于绝对,1940 年代《思想与时代》月刊学人群关于科学与人文的讨论,或可展现与此不同的一个面相。

林毓生则认为“科玄论战”中的双方,无论是“玄学派”的张君勱,还是“科学派”的丁文江,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论点,即“他们都相信主观性(主体)与客观性(客体)是根本不可逾越的,彼此完全绝缘地各自属于一个独立的范围,他们同时都认为归纳法是科学方法的主要部分,能对付客体范围内的问题。”〔4〕由此,林氏断言:“在‘科学与玄学’这一重要论争的灾难性后果中,理知训练的创造性传统,找不到扎根的沃土。因为,人们普遍地认为任何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把归纳法的形式方面应用到自己的学科上去——并认为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探索活

〔1〕 段治文在《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一书中考察了五四至抗战前,“科学”及其实践在这一阶段是如何演变和发展的,亦为纠正学界对于“唯科学主义”研究的偏颇之处。参见氏著《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22—323 页。

〔2〕 [美] 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7,158 页。

〔3〕 [美] 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第 153 页。

〔4〕 林毓生:《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含义——对民国十二年“科学与玄学”论争的省察》,收入氏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11 页。

动。因此,他们不能了解如何形成理论性的有意义的问题才真是学术研究的关键。”〔1〕林氏对于论战双方的主力张君勱及丁文江的分析或有其睿智所在,但对于“科玄论战”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估计,不免有所夸大。就其返观 1940 年代《思想与时代》月刊同人,无论是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张荫麟、贺麟及郭斌龢,或是未出国门的苦学者钱穆等人,都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失的一种科学精神,即对于纯粹“智识”的兴趣及探究,并大力提倡纯粹科学精神的培养。

叶其忠曾对 1923 年“科玄论战”的评价文字写过一篇再评价之鸿文,〔2〕亦可见此问题在现代思想史上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叶其忠的评价文字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论战者之一的张君勱自己对于“科玄论战”的评价,叶氏认为这部分评价是最重要的,一直以来却几乎被忽视;二是不同观点的评价,叶氏将其具体分为两部分,一为“主流的、非马克思派参战者或评论者的评论及批评”,另一为“非主流的、所谓马克思派的评论及其批评”;三为叶氏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此无疑为叶氏此文最有创见的部分。叶氏云:“这一己之见加了些新的思考因子,企图超越过去的评价,如尽量参考一些科学家、哲学家及哲学科学家的看法。这方面迄今极少有人尝试做。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假设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没有共同处。这个假设是站不住脚的,虽其原因可能是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间长期不幸对垒的结果。”〔3〕

叶氏关于“科玄论战”评价之评价,相当细致地考察了论战参战者

〔1〕 林毓生:《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含义——对民国十二年“科学与玄学”论争的省察》,收入氏著,穆善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第 329—330 页。

〔2〕 叶其忠:《1923 年“科玄论战”:评价之评价》,《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6 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 年 12 月版,第 181—234 页。

〔3〕 叶其忠:《1923 年“科玄论战”:评价之评价》,同上,第 182 页。